

读者参考

丛书
71

守住人生的底线

◎中美日“方程”求解

◎不必为将来而廉价生活

◎成千上万的丈夫 ◎人类为何爱足球

◎中国人的另类脸谱 ◎还给孩子真实的世界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住人生的底线/《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10
(读者参考丛书: 71/林雨主编)
ISBN 7-80730-228-3

I. 守... II. 读...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3126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所用图文资料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请即与编辑部联系。

守住人生的底线

读者参考丛书(71)		2006 年 10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天 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7-80730-228-3/Z·9		定价:10.00 元

对幸福征税

□邹啸鸣

改革开放以前,手表是非常重要的奢侈品。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每个小伙子都必须讨老婆,手表和自行车、缝纫机合称“幸福三大件”,但当时鲜有小伙子能凭自己的能力买得起。并不是那些小伙子特别懒,而是因为当时的大锅饭分配制度扼杀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产出越来越低,收入水平也就不高。

来自上海的知青则拥有一定的地域优势,他们的家庭一般可以为他们寄去一块珍贵的手表,满足他们的炫耀本能;所以这些上海知青在冒着炎炎烈日割水稻的时候,总会“不经意地”将戴有手表的那只手高高地举起,同时伴随着一声埋怨:“今天真热呀……”于是,无论是城市的“小芳”还是农村的“小芳”,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当时,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块,据说成本只有不到30元;所以,当时的领导人口口声声的“控诉资产阶级暴利”的真诚,我是很怀疑的,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别人的暴利,绝不反对自己的暴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各个省份才开始被允许生产手表,于是,“庐山牌”手表虽然只卖60元一块,但是效益却好得令人眼红,只有官员的子弟才有可能进

生产此表的工厂工作。

后来,日本的电子表冲击了手表市场,但绝大部分是依靠“走私”进来的。虽然政府花大力气打击走私,却基本上无效,因为有能力走私的,大部分未必是老百姓。后来走私实在太猖獗,以至于电子表卖到5元一块,同时手表的替代品出现了:BP机和手机都具备计时功能,而更具备炫耀功能,于是走私停止了,人们的福利却大大增加了,手表就这么从“三大件”的舞台上退休了。

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价格越高,有能力购买的人就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很高的评价。垄断企业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产品的价格越高,成交量就越少,消费者剩余大都转化成为了生产者剩余,同时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福利“无谓损失”。垄断者因为已经达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均衡状态,所以并没有动力降低价格,他们更有动力维护垄断地位。如果媒体、法律和学者的知识也在他们的垄断势力范围内,那么他们这种维护垄断地位的行为,就会被制造出足够的“理论依据”和“行政依据”。制造这些依据的人,只要社

会福利损失的阴影不会笼罩到他们头上,他们就会真诚地为垄断辩护。

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双方共同确定的。垄断企业无法改变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但是可以确定自己的边际成本。“企业垄断地位越稳固,边际成本就容易偏高,企业的消费现象就越严重。边际成本越高,确定的价格就越高,该产品越显得像奢侈品,而奢侈品的需求弹性很大,意味着消费者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手表对当时的结婚青年而言,是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么小两口和老两口用吃咸菜的代价积蓄,以获得那“三大件”带来的幸福感;要么就是结婚缺少“三大件”,沉浸在对它们的遗憾之中。无论是哪种情况,老百姓的幸福,都因为与征税同效的垄断而减少。

所以结论很清楚:“上海牌”手表经历了奢侈品、必需品、低档品三个阶段,原因是,竞争以及替代品的出现导致其价格下滑,国民收入的提高导致其地位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该产品增加社会福利所做的工作是:允许其他厂商与垄断厂商竞争、“假打”走私、鼓励BP机和手机的发展。说得更简单点:政府对幸福征税的税率下降,就导致了更多的小伙子有能力买“手表”献爱心。

新的“三大件”据说是房子、车和文凭。目前怨言最集中的是房子,所以最值得关注的也是房子。

目前的媒体有个奇怪的论点,

好像坚信房价是“忽悠上去”的,于是需要“忽悠下来”。于是政府的主要精力就是打击投机分子唯利是图,媒体的主要精力就是配合着往下“忽悠”;而买不起房的潜在消费者则在这种“单向忽悠”的狂轰滥炸之下晕头,拾起来自传统文化的对“奸商”的仇恨,当做自己的判断依据。于是,那些向“奸商”开炮的“学者”都被看成是“良心”的代表,于是大家都将期望寄托在这些“学者”身上。

其实这些“良心学者”一套房子都不供给,所有的房子都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供给的。这些“奸商”受到的打击越激烈,其垄断程度只会越高,房价也只会越高而不是相反。这与当年打击手表“走私”的效果有些相似,走私越烈,老百姓的消费欲望越容易得到满足,而垄断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消解;所以,这些“学者良心”的方向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也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住房改革以前,城市的房子是由“单位”提供的;但是这些“单位”只会关注单位内的人,不会关注单位外的人。于是,那些没有任何“单位”的人,没有机会责怪奸商的唯利是图,只怪自己“命”不好,只怪这些单位太小、太少。

支撑房价高企的力量来自需求者的评价。需求者的评价来自人人都具有对更高福利的追求本能,所以,最有效打击房价的因素是让消费者欲望减退。比如反复宣传住小

房子光荣、住大房子可耻；宣传几代同堂光荣、小两口与大两口分室而居违背人伦道德；其他围魏救赵的方法还包括假借美化城市环境，将居无定所的流民都赶回农村；等等。只要这些工作落到实处，那么一定会有效地降低房子的消费潜力。当然，更直接的方式是找个理由，将住大房子、好房子的人通通赶出来。那么人们不但不愿意买大房子，甚至不敢住大房子。那么住小房子的人就不会有什么怨言了。

政府、“良心学者”和媒体对投机者的指责隐含一个逻辑：这种“炒作”导致房价一直上升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其实相当于“泡沫”，导致人们消费的“不理性”，使得低收入者买不起越来越贵的房子。于是，征收交易税的目标是打击投机，将房价“压下来”。

其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炒房者买了房子以后，房价涨幅超过房租涨幅太多，出现严重泡沫，那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是将房子卖掉，自己租房子住，这将有效约束房价涨速；那么生产者的理性选择是更多的投资商会将资源集中到这个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行业，房产商会供给更多的房子，这也会将房价涨幅压下来。这个过程，政府什么也不用干，一切都会自然发生；但是政府对二手房征收交易税越高，交易量就越少，房价涨幅就越容易超过房租涨幅。

北京、上海有一部分房价上涨

的因素是外资“热钱”，他们“赌”人民币升值而提前进入，问题在于他们“赌”对了，这个问题的出路是人民币自由兑换，而不是将房价“忽悠下来”。

如果房价不涨反跌，亏的是购房者自己的钱，他们并不会为此找政府的麻烦。如果炒房者买房子使用的是贷款，那么该担心的是银行而不是政府。如果人们可以赖账不还，那么问题存在于执法环节而不是炒房环节，因为其他的贷款也会面临赖账不还的问题。

我不会去指责“暴利”，因为对暴利最有效的指责是消费者变成投资者参与投资，分享暴利，这种参与一定会导致价格下降；而真正值得指责的，是政府对参与竞争所设置的障碍。

我也不愿意指责房产商的成本，因为在竞争条件下，成本高的企业会被其他唯利是图的企业所淘汰，所以，降低成本是企业自己最关心的事情，无须消费者和学者多管闲事；但是中国房子的成本则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地方政府是土地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唯一供给者。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持有者所在意的，并不是垄断或者竞争对降低“无谓损失”、增加社会福利的效率，在意的仅仅是雁过拔毛的效率。

我更不愿意去指责“投机”，因为投机者事实上是用自己的钱承担投机失败的风险。那些因为投机而

赚了钱的人基本上都在媒体的注意力范围内,而那些因投机而亏钱的人,媒体并不关注,因为从他们身上,媒体很难捞到多少“红眼病”读者的注意力。

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子的问题,是收入能力问题,由于收入能力低,一切消费品都显得太贵。在农村,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房子盖得也很舒适。某个地区的房子破旧,原因是当地的生产力落后,并不是因为当地的房产商的心太黑。手机一万元一个的时候,低收入者何必要省吃俭用买个手机来炫耀呢?又何必因此指责手机商的心太黑呢?为何不考虑租机来替代买机呢?所以问题的关键要检讨是什么约束了人们收入能力的提升。

政府如果真想将房子提升为向低收入者提供的福利,那么所应该做的,与提升手表的社会福利方案类似:1. 鼓励更多的房产商参与竞争以压低价格;2. 退出地产的垄断地位,对幸福少征点税;3. 放弃更多行业的垄断地位,降低税率,以鼓励私人在这些行业增加投资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反,如果政府死死咬住幸福征税,那么征税的效率越高,新婚夫妇的幸福感就越少。

千万不要指责购房者“不理性”,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不动产的保值能力。购房者之所以用房子保值,是因为产生了对货币贬值的预期。黄金近来升值到 26

年来的最高点,也在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着这种预期。当然,房子要能够担此重任,是建立在对政府的稳定预期基础上;因为购房者希望:政府最终会将房产那“70 年短命使用权”延长为永久性使用权。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年杜少陵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提出了期望,表达了茫然,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追求的一直就是“安得官邸千万间,大庇天下官员俱欢颜”;而改革开放以后,私有企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才有效地提升了平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而且他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不是要打击他们的努力,而是要为他们的努力扫清障碍,包括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
· 第 22 辑》)

我国最早的身份证

身份证早在隋代就开始使用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为官员们颁发的“鱼符”。鱼符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形为鱼,分左右两片,里面记的有官员的姓名、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许、出行享受何种待遇等,比隋代仅有姓名、官品的身份证要完整得多。

(摘自《百科知识》)

高增长为何没有带来高就业

□周天勇

学界、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高增长和高投资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平衡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稍微一放就恐惧过热、稍微一控就陷入过冷？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中，投资和出口的效应较大，国内消费方面的拉动力太弱，原因在于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建设，国有企业投资，外资等。这种局面下，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等基础工业建成后，增加不了多少就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和外资，其容纳的劳动力就业相对也越来越少；而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特别是技术和资本含量的提高，也会相对和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就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高增长，而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却越来越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因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投资增长过快时，物价可能上涨；为了稳定物价，要控制贷款规模（由于土地抵押贷款的发展，加上建设项目需要土地承载，土地的供给水平也与信贷和投资规模正相关，于是2004年的宏观调控采取了

信贷和土地双紧的方式）；而收紧贷款规模过度，则经济没有足够的消费支撑，很容易陷入低迷。即形成宏观调控一控就大落、一放就大涨的恶性循环。从经济学的流程看，消费决定于收入，收入的大部分决定于就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越慢，城镇人口从业率越低，在GDP分配中资本分配的比率越高，劳动的分配比率就越低，消费能力就越弱，这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消费严重不足的最根本性的原因；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不去解决最主要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就业问题，而想别的办法，无疑是隔靴搔痒。如加大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投资和消费的比率就将发生重大的改观，投资起伏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就将会减弱，国民经济运行由于消费比率的上升，稳定性也将会显著增加。

而要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扩大内需，关键是要鼓励民间投资、民间创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口，大规模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

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

业的主要渠道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可是，从中国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增长情况看，1998 年企业法人 262.8 万家，2004 年为 325 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后，只增加了 62.2 万家，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每年仅增加 10 万家法人企业；而根据统计，1999 - 2000 年在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减少 770 万户。

我们希望就业压力一年比一年小；但必须正视的是，一方面，国有和集体企业总体上在减少就业岗位，行政和事业单位要控制编制和进行改革，外商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整个经济的技术在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也在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的相对收益越来越低，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越来越大，新增劳动力也规模很大，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往年积累的失业人员规模也不小，微型和中小企业增长缓慢，个体工商户在大规模破产，因此，就业形

势的好转任重而道远。

宏观调控应当总体上控制投资，但是要调整投资的结构，适当压缩不增加就业的投资规模，积极鼓励能大量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的投资；通过扩大国民经济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能力来扩大消费。当务之急是，政府要放宽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的注册、市场准入和经营等管制；杜绝十几个部门对创业和经营的交叉、矛盾和恶意执法；让利于民，大规模清理和停止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和罚款，对创业和就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并提供创业和就业培训等。如果政府能够调整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让利于民，并且调整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改善投资与消费比例，那么，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就业的协调，就不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话了。

（摘自《文汇报》）

今日说法

我坦白告诉你们，其实前 200 名学生都没有差别，前 200 名跟前 10 名没有差别。您要换一套卷子的话，排序就变了。高考状元是偶然性造成的。对于我们学校，能招前 200 名的学生就行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社会过分热捧高考状元的现象作

如此回应。

我总觉得钱是带不进坟墓的，但钱却能把人带进坟墓。

——19 岁的丁俊晖对金钱的态度富有哲理。

良医有两种：一种是自己能够把病人治好；一种是知道自己治不好而把病人推荐给治得好的医生。

——当您在医院大把大把花钱而病却丝毫不见起色时，您就会感到后一种良医的难能可贵。

中国：自主创新是软肋

□裴少铭

世界经济论坛“2005~2006 年度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中国的排名下降到了第 49 位。

排名引发不少国人忧虑：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综合国力也在不断上升，为什么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却走出了下降的轨迹？

如何看待排行榜变化

对于中国竞争力排名下滑的现象，软银亚洲投资基金总裁阎焱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的质量差，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 20 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而这种消耗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林跃勤研究员则认为，中国政局长期稳定，国际收支情况良好，经济发展速度强劲，所以此次排行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评分是比较高的，排名也比较靠前。之所以我们的综合位次下降了，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政府公共服务”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上的得分拖了后腿。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基本上认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所采取的标准，因为从理论上讲，市场是促进效率的，政府是促

进公平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明显，企业、社会自主创新的能力就越强。

如果国家干预过多，尽管能够相对更加公平一些，但是私营经济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就会变慢，会影响效率导致影响竞争力。

但赵锡军同时质疑，这个逻辑能否推而广之运用到所有国家和地区上去呢？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人们，有一些国家确实是因为政府干预少而其竞争力加强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经济由于没有国家的引导，企业不能更好地发挥自主创新的能力，经济效率反而很低。特别是对那些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健全的国家而言，后一种情况尤甚。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现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其经济发展的重点也不相同。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还处于制度建设时期，而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侧重企业能力、要求经济效率的阶段。

比如，美国的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市场机制以及其他相关体制都已经建立起来；而中国处于初级阶段，用美国的标准恐怕

就不太现实。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笼统地把所有国家都放到一个框架里面去衡量,会造成非常难以解释的怪现象。

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用那种成熟标准去衡量,就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既然经济竞争力下降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跨国公司千方百计都要挤进中国市场来。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研究员则提醒说,中国的发展正在引来世界各国的瞩目,有些国家还在散布“中国威胁论”。个别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也存在戒心。“在这种情况下,淡化对国际排名的追求可能对我们更有利。我们需要埋头发展,需要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克服自己的困难。”

两大软肋如何补钙

针对此次排名对中国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较低评价,林跃勤承认其合理性并分析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审批手续多、办事效率较低、成本高、不确定性、透明度不够高等方面。据统计,在中国发展商务的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5%。

2005年9月,国际金融中心IFC发表了《2006年度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对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

根据这项调查,中国的企业经

营环境宽松度排在第91位。另有调查表明,在内地办一家企业平均需要48天,在香港只需要11天。在中国内地,私营经济的准入门槛高,甚至存在一些看不见的“玻璃屋顶”——有些制度允许的事情,但在执行中却存在诸多的条件,甚至办不了。

杨宜勇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确实存在突出的问题。他建议,以后在具体办法上,地方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充分履行职能,对于那些要钱不要命的项目要着重监控,要把发展真正转入科学的轨道。

针对中国在此次排名中暴露出来的另一个弱项——企业自主创新,林跃勤坦言,这方面确实较弱。我们的出口几乎全是“贴牌贸易”,自主品牌很少,缺乏核心技术。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体制密切相关。

由于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国企技术创新动力不够,国家给予创新补贴资金但又没有考核、监督机制,所以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民营企业由于发展时间比较短,缺乏创新实力,又无国家拨款,所以在技术更新上是力不从心。

因此,在技术创新方面,国家应该进一步增加投入,创造一个公平的创造力竞争环境,想方设法提高国企和民企的自主创新能力。

(摘自《环球》)

经济集权

是中国数次改革失败的原因

□叶 檀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经济改革，本意当然是为了强国富民、“与民生息”，很少有发了狂的统治者，为剥夺民众而进行改革；但其后改革往往不可抑制地走向剥夺民财之路，实在是越来越强大的自我膨胀式的路径依赖，让统治者不得不向既得利益者妥协。无论是汉代的盐铁专卖、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重新界定田亩、廓清赋税的努力，最后无一不走向与民争利的宿命式悲剧。

专卖毫无疑问可为朝廷敛财，当政府急需用钱时，对于社会必需物资的专卖与金融垄断经营权就会适时推出。如汉代推出盐铁专卖，主要原因在于武帝的开疆拓土急需大笔费用，王安石变法也是因为宋朝的岁贡以及与西夏作战，在经济上捉襟见肘。这些改革有预设的前提条件，如政府是公正的，而商贩是逐利无良的，把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权收归政府，可以使百姓享受到更公平的价格与更合理的服务。可惜这种政府只存在于儒家的理想社会中，当政府经由官员的手真正地介入经济调控中时，他们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

比如，当汉初的朝廷垄断了农具铁器的供应时，农民不得不出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得到一堆质量低劣得多甚至无法使用的农具。朝廷当然规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但这一价格从来只落在纸面上，而朝廷也没有办法广泛地实施有效的质量监督体系。无法可施，西汉初期的一些农民只有舍弃农具，胼手胝足，回到前铁器时代；但你不能指责朝廷不作为，他们仍然惩处了一些贪赃坑民的恶吏，却终于面对越来越泛滥的群体性腐败而败下阵来。

中国的盐铁专卖从春秋时代绵延数千年未曾断绝，原因就在于，在农耕社会，盐铁实在太重要，离开这两项物资，农民比茹毛饮血也就差得不远。在专卖制度下，官员上下其手，腐败大行其道，且为防止私贩，有严酷法律相随，在某种程度上，专卖制度成为民众的生存税，只有得到特批手握垄断权的商人们发了大财。

不过，一项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政策坚持不了那么久，其中的好处就是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

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确实获益匪浅。

王安石变法,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朝廷财政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钱粮充盈;但与此同时,民众叫苦不迭,他们在一心讨好新政求取政绩的官员逼迫下,不得不向政府借用比市场价格还高的青苗钱,在缴纳了雇佣兵的份子钱之后还不得不扛起枪来当团练。以均输法与青苗法为例,王安石的本意是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由政府来根据各地商品价格不同,亲自长途贩运,损有余以补不足,以期起到稳定市场价格的作用;但该政策到了一些官员手中,却不顾价格一味转运,重重盘剥,岂止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简直还是各地价格动荡的罪魁。青苗法同样如此,本来政府是想在收割前农民青黄不接时给予“低息贷款”,等收获后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于国于民双益;但现实情况是,官员为政绩强迫农民借款,并且借款利息高过市场,除了中饱私囊者之外,朝廷与农民双输。政策大面积扭曲的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豪强与官员串通一气,农民多了一重盘剥者。

根本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传导过程中,政策遭到扭曲几乎是必然的。

在政府方面,越是依赖于经济

集权下的垄断收益,越是会为这些垄断找到种种理由,事实上,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这些旨在加强政府经济调配权的改革无一例外地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欢迎。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满足了国库的暂时所需,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无数的机会主义行径。直到民国时期,孔祥熙执掌央行帅印,其对金融、税收的调配也一味以满足中央政府的短期需求为能事。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就在收入与路径依赖过程中,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可以说,垄断收入越高,社会经济越是危险,当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时,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千金”原指男子

古时的“金”指黄铜,当时黄铜很少,故千“金”难得。《南史·谢朓传》记载,谢朓幼时聪慧能赋诗,人称神童,其父谢庄爱之,当众抚其背道:“真吾家千金。”后来,“千金”的词义指向由起初的称呼男子,渐渐改成专称女孩子。历史学家考证,到了元朝“千金”就专指女孩了。

(摘自《百科知识》)

中美日“方程”求解

□傅梦孜

对中日关系现状有所感知者，都多少对东亚地区这一“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前景不无忧虑。小泉虽将淡出日本政治舞台，但改组后已露出强势形象的继任者，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似乎较小泉有过之而无不及，若自民党在今年9月的大选中获胜，则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景更不乐观，对此人们不能不有一个基本的预计。

小泉对靖国神社的持续参拜刺激了邻国，指望日本一些政客自我约束或对历史问题能有一个较清醒的认识，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但参拜这张牌的效用终将边缘化。即使在日本，小泉一意孤行损害与邻国关系的行为也没有得到民众与媒体的认同，近期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反参拜之声四起，国际对参靖的批评更呈扩大化趋势。东南亚国家对小泉这种无所顾忌参拜靖国神社的“冲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行为已损害了东亚合作的基础。美国媒体也一反过去默不作声的立场，认为小泉所为是一种无谓的挑衅。美国这种态度转变的深层忧虑在于，如若任由小泉在挑衅之路上继续滑下去，势必有一天会颠覆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正义性，并最终挑起日本对当年遭遇核武打击的民

族仇恨。

善玩离岸平衡的美国，虽然对小泉的一意孤行心存忧虑，但尚未有真正的“制止动作”。人们看到的反而是，美日同盟还在不断加强，个中原因即美日都有制衡国力与影响力迅速上升的中国的战略需要。当然，美国利用日本多少也有捆住日本这个并不令其放心的盟友的考虑，还有应对地区危机及非传统安全挑战的需要；但美日战略舞步并非总是合拍的。对日本来说可能从中衍生新的筹码，即在领海、油气田等与中国的争端中自认为可以无所顾忌地刺激邻国。

美国对日战略有其难解之处。“捆住日本”与“放虎归山”、鼓励日本发挥军事大国的作用之间，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与美国以日本为主轴的亚洲战略之间，一直视日本为“小兄弟”与支持日本“入常”、进而使之成为世界权力圈核心成员之间，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悖论。对美国而言，日本花样翻新地寻找议题刺激中国，不仅危及对美国有重大战略利益的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损害解决地区性问题的共同认知基础，也使得美国处于一种难以置身事外的尴尬境地。人们甚至认为，

日本无谓的强硬出格行为走到某个临界点时,日中冲突的可能性大于美中冲突,因而存在着美国被拖入一场并不情愿被卷入的中日严重争执甚至冲突之中,而这可能使美国处于两难境地。美国如果以同盟名义“挺日”,则其设想的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战略前景只能是镜花水月。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所触及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了历史上少有的程度,相互依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不仅在经济上如此,在政治、外交层面同样如此。中美关系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影响正超越双边范围,具有全球意义。中美不希望发生战略性冲突,亚太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国与美国、与中国都有不言而喻的重大利益,因此更不愿意在(假设的)中美对抗与冲突中简单地做出非此即彼的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军事同盟逐渐弱化,虽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对今天世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安全挑战,已起不了多大作用。恐怖主义、海上通道安全、传染病扩散、跨国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恶化等已构成更为紧迫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大国的结盟,对付得了恐怖主义吗?不是大炮打蚊子,就是拳头打棉花,其效果可想而知,在其他方面同样如此;而超然其外的其他任何战略目标,只能窒息东亚

地区正在涌动的地区合作,扼杀地区发展活力的可持续性,直到触发所有国家极力避免的对抗与自危意识。

中美日三国相互关系利害重大,对各自国家如此,对东亚如此,对世界同样如此。中美日三边中任何双边安全关系的强化都不应针对第三国,而任何一组双边关系的恶化对所有三个双边关系同样会产生难以避免的附带性冲击。在一种经济上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全球化时代,中美日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多赢而非简单制衡关系,各自心中并非无数,尽管个别国家政治家可能会倒行逆施。培育一种对话的良好政治气氛,需要显示政治勇气,推动三方官方战略对话,以增加互信为出发点,探讨如何化解三角“方程”,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摘自《世界知识》)

今日说法

强硬并不意味着爱国。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现在很多中国人仍然有一种“弱国心态”。具体表现就是,把自己夸大,对别人的赞扬或者批评非常介意,而这些恰恰是对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中国人在遇到国际纠纷时,应表现得冷静一些,有大志的人才能真正韬光养晦。

马六甲海峡的大国博弈

□王 娜

马六甲海峡位于东南亚要冲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之间,全长约 1080 公里,是连接南中国海和安达曼海的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水道,它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重要通道,素有“东方的直布罗陀”之称。马六甲海峡地处中东—东亚石油运输航道的咽喉部分,承载着全球贸易中三分之一的货物、二分之一的石油、三分之二的天然气的运输,已经成为仅次于英吉利—多佛尔海峡的全球第二大繁忙水道,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生命线”。

目前海峡的主权属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由两国和新加坡共管;然而美国、日本、印度都出于本国战略的考虑,意欲布防马六甲,它们与共管海峡的三国在这块棋盘上展开了一场战略博弈。

2004 年 4 月,驻亚太地区美军总司令托马斯·法戈上将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区域海事安全计划》的反恐新方案。根据这项计划,美国将向马六甲海峡派驻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以防止恐怖主义袭击,打击武器扩散、毒品走私和海盗等犯罪活动。虽然由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驻

兵马六甲的目的,但是却使美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

日本进口原油的 90% 和近一半的其他进出口物资,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运输。与美国赤裸裸地发表“进驻宣言”相比,日本的渗透政策更为怀柔,也更为隐蔽。日本曾多次向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表示要参与马六甲海峡安全维护的愿望,并主动赞助了保卫海峡安全的某些活动。

日本于 2004 年 11 月推动东盟各国连同日、朝、中、印、斯里兰卡、孟加拉等 16 国在东京起草了《关于打击亚洲海盗活动和武装抢劫船只行为的地区合作协定》。2004 年 3 月 9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有事(紧急状态)相关 7 法案”假设了“周边地区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这个“周边”不仅包括台湾海峡,也包括了稍远的马六甲海峡。

每年有 114 艘特大型油轮共计 95 亿桶石油经马六甲海峡运往印度。印属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位于马六甲海峡的西部入口处,是印度的东方门户。

印度海军希望通过控制马六甲海峡,逐步实现其立足太平洋、前瞻亚太的战略目标。

为了制衡美、日在本地区的扩张野心,马六甲海峡的共管三国有意邀请印度参与协助马六甲防务。在美军驻防马六甲海峡问题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立场有一定差别。马来西亚与印尼主权意识强烈,坚持反对美军派兵马六甲,而新加坡则支持美国立场。新加坡与美国在军事领域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已成为美军东南亚基地群的中心。

中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而从这三个地区进口石油的运输全部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中国在2004年进口原油数量突破了1亿吨大关。按照国际通常做法,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缘因素(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有领海主权之争),中国军事

力量很难进入东南亚。共管三国(当然还有美、日)都不愿中国参与海峡安全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能施加的影响力有限。这就要求决策层运用外交智慧,破解“马六甲困局”。

中国应尽快建立属于自己的、可控的海上运输体系以及相关的安全保障制度。为避免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一方面要加大从中亚各国、俄罗斯进口石油的比重;另一方面,开辟另一条航道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考虑到今后进口原油仍主要来自中东,应积极促成泰国克拉地峡运河建设。计划中的克拉地峡运河长100公里、宽400米,开通后,船只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可直接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进入太平洋的泰国湾,航程至少可缩短700英里,可节省2~5天航行时间。按照初步测算,开凿克拉地峡运河需历时10年,耗资250亿美元。

(摘自《领导之友》)

今日说法

我怕穷,也怕展示穷,同情不是最重要的,苦难并不是博得别人同情的资本,最重要的还是奋斗,改变才是最重要的。你穷,人家同情你,但是倘若你一直穷下去,别人不会同情下去的。

——“感动中国”的洪战辉与上海大学生共话“今天我们怎样成

长”时说。

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快乐的车夫。有人说,您是因为赚的钱多,所以当然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

——上海“的哥”臧勤因为善于规划工作,每月收入超过了8000元,为此,他被微软公司请去给员工们讲了一堂MBA课程。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工作心态。

中国“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真相

□沈晓杰

在住房问题已经被公认为当今中国人最沉重的生活负担之一时，中国却在最重要的住房指标上名列“世界第一”，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拿来说事。

在最近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有一个词正被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官员和专家等房地产“利益关联者”挂在嘴边，这就是“住房自有率”。

和“房价收入比”一样，居民的住房自有率是衡量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居住问题解决的好坏、住房政策正确与否和房地产市场导向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在最近有关房地产的“理论和舆论”的争辩中，总是能看到这样一个表述：“中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6月26日，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的一位官员在某全国性的经济周刊上发表文章称，“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居世界第一，‘居住必买房’是危险导向”。在他看来，“30%的人有财力支持买房居住，房地产市场就相当不错了，其余的70%应是租房群体”。

在住房问题已经被公认为当今中国人最沉重的生活负担之一时，中国却在最重要的住房指标上名列

“世界第一”，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拿来说事。如此的反差，使人不得不产生疑惑。

谁制造了住房自有率的世界第一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住房自有率全世界最高”一说最早可追溯到2002年。当时在包头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建设部的一位副部长宣布，中国的“城镇家庭80%拥有住房，农村100%拥有住房，住房自有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中国人“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的“美名”从此而来。

然而，中国中央政府和统计局的网站上并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中国曾经取得过“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对住房自有率进行过任何全国范围内的专门统计调查。

在国际上，“住房自有率”是个基本的通用名词，指居住在拥有自己产权住房的家庭户数占整个社会住房家庭户数的比例。在建设部网